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

苏俄的“新方针”

奥托·鲍威尔著

（供批判用）

7143

39

苏 俄 的“新 方 针”

〔奥〕奥托·鲍威尔著

史 集 译

本书是供批判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Otto Bauer
Der "neue Kurs" in Sowjetrußland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Wien 1921

根据维也纳人民书店 1921 年德文版译出

苏俄的“新方针”

〔奥〕奥托·鲍威尔著

史集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3,000 字

1977 年 10 月第 1 版 197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3002·183 定价 0.14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者说明

1921年11月初，奥托·鲍威尔在维也纳《工人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11月中旬汇集成册，还加了一篇序言，用《苏俄的“新方针”》这一书名出版。

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是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的主要理论家。他基本上属于第二国际内以叛徒考茨基为首的“中派”。但是，鲍威尔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有它的独特之处，比考茨基的观点更加隐蔽，更富有欺骗性。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鲍威尔曾接二连三发表文章和小册子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早在《苏俄的“新方针”》发表之前，他就写过两本小册子，即《俄国革命和欧洲无产阶级》与《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两本小册子中，他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反对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方针。他认为，俄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无产阶级只占人口少数，因此，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不顾俄国的客观经济条件想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尝试肯定要失败。他竭力歪曲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这种专政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是“对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而且必然会引起内战，造成巨大的经济破坏。他断言，俄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走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个暂时的发展阶段。在《苏俄的“新方针”》这本小册子中，鲍威尔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上述

谬论。列宁对《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苏俄的“新方针”》等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27—328、630—631、647页)。

1920年末,苏俄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开始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为了尽快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1921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决议。列宁在报告中指出,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采取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要使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解决好工人同农民的经济关系即经济结合的问题。列宁说:“从理论上说来,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能不能这样呢?能够,因为问题只是在于分寸。”(《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7页)实行新经济政策,容许城乡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向资本主义进攻中的暂时退却,目的是积蓄力量,保证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巩固的经济联盟,以便重新开始进攻,消灭国内资本主义的残余,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托洛茨基派等都纷纷跳出来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他们诬蔑新经济政策是纯粹的退却,是向资本主义蜕化。鲍威尔的《苏俄的“新方针”》这本小册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抛出来的。

鲍威尔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根本不懂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却一再坚持他过去对俄国革命的观点,断言俄国的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俄国必然要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制。他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

就是“重建”资本主义经济，而“重建资本主义经济在共产党的专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有“逐步地和平地废除它的专政”才有可能，否则群众就会起来推翻这种专政。他叫嚷“取消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还扬言，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将用所“掌握的一切精神武器”去支持俄国内部反对苏维埃制度的力量，取消“恐怖主义的专政”。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痛斥了鲍威尔污蔑新经济政策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列宁指出，鲍威尔“在战后和考茨基一样，成了可怜的市侩”，“无论是奥托·鲍威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导者们的说教，还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说教，都表现了他们的本意：‘革命跑得太远了。我们一向这么说，现在你也这么说了。让我们再来重复这一点吧’”。列宁愤怒地写道，在苏俄处于比白卫分子进攻时更困难得多的条件下，鲍威尔等人发表这种谬论，我们只能把他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30—631页）加以枪毙。列宁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18页）。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之后，列宁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并且提出了一个口号：重新配置力量，“准备向私人经营的资本进攻”（《列宁全集》第36卷第593页）。鲍威尔对新经济政策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和攻击，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了。

本书是根据维也纳人民书店1921年德文版译出的。

1976年12月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1. 苏维埃共和国的第四年 | 5 |
| 2. 资本主义贸易和苏维埃资产阶级 | 10 |
| 3. 工业和租让 | 15 |
| 4. 专政的历史意义 | 21 |

序 言

我在以笔名亨利希·维贝尔发表的小册子《俄国革命和欧洲无产阶级》(1917年维也纳人民书店版)中描述过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这本小册子是1917年10月10日即十月革命前一个月脱稿的。早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就说过,我深信俄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由资产阶级建立,只能由工人和农民建立,而工农为了打退反革命和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首先必须取得统治,只有在进行了土地革命并巩固了它的成果之后,农民群众才会重新推戴资产阶级,从而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可见,那时候我已经把同农民阶级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的暂时统治,看作是俄国走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个必要的发展阶段。

一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了。那时工人和农民的统治采取了苏维埃专政的形式。我在1920年4月12日完稿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20年维也纳人民书店版)中描述了俄国革命的这个第二阶段。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也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本身必然会通过土地革命创造前提,使农民阶级上升,从而使俄国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制。

布尔什维克狂热地反对我对俄国革命的意见。我让历史本身来做出反批评。历史迅速而彻底地做到了这一点。苏维埃政府在农民群众的压力下从1921年春天不得不实行的“新方针”,证实了

我的预见。

我曾经预言，农民的私有制会摧毁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拉狄克对我的答复是，粮食垄断制将把农民经济引上社会主义的轨道。^①

1921年3月21日苏维埃政府却不得不取消粮食垄断制而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粮食贸易制。

我曾经预言，俄国将发展到采取独特的混合的经济形态。“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中的国家社会主义，销售商品的合作社组织，农民的个体经营，趁城市缺粮而增长起来的农民财产，依靠黑市（这在农民的私有经济基础上是不能根除的）并同它一起发展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在特殊的租让权基础上产生的、由外国资本建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俄国的新经济将由以上这些因素组成。”（第70页）拉狄克辛辣地嘲笑了这个“新的孟什维主义哲学”。^②但是，列宁在几个星期以后写道：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这些成分是：

- (1) 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
- (2) 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 (3) 私人资本主义；
- (4) 国家资本主义；
- (5) 社会主义。”^③

① 拉狄克《第二半国际的理论和实践》1921年汉堡版第9页。——作者注

② 同上书，第6页。——作者注

③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4—505页。——译者注

可见列宁也认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不是要堵塞或禁止资本主义的发展”^①，而是要加强俄国过渡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来反对自然经济的和小生产的成分；其途径必定是，对外国资本实行租让制，鼓励合作社，吸引代购代销商人来推销国家货物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最后把国有的企业租给资本家。^②现在有没有人能够比这更加透彻地证明我的“孟什维主义哲学”——不久前拉狄克还认为这是十分可笑的——是正确的呢？

布尔什维主义的“新方针”就这样全面地证实了我的关于俄国革命种种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还有争论的只是一个问题，即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上的变革将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我在11月初发表于维也纳《工人日报》上的四篇文章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我把这四篇文章不加改动地在这里发表。

不言而喻，俄国布尔什维克将首先把我对他们的“新方针”的分析误解为对俄国革命的“诬蔑”，看作是对它的“背叛”。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处在反对最强大的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之中。谁处在这样的斗争之中，谁就需要幻想。无论在阶级斗争还是在民族战争中，可能彻底胜利的幻想是唯一使战士产生空前勇气和最大毅力的力量源泉。这种力量源泉是在斗争中“坚持到底”的精神上的先决条件。如果远离炮火的我们去嘲笑火线上的人的那种为生存所必需的幻想，那是要不得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陷入只有火热的斗争才能为之辩解的幻想之中，也同样是不适当的。如果说，马克思教给我们的历史观，跟斗争者自己从战斗的激情中培育出来的那些意识、幻想相比，不能有所不同地、不能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代最巨大的阶级斗争，那么这种历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9页。列宁的原话是“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译注者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9—524页。——译者注

史观对我们是没有用的。

但是,如果说,当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坚持”斗争的时候幻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力量源泉,那么一旦必须停止那种为取得无法取得的东西而进行的斗争,以防彻底失败的时候,幻想对于斗争者本身来说就成为最大的危险了。苏维埃政府及时地同它的经济上的种种幻想实行决裂,这是它的巨大功绩。但是,如果在经济上实行新方针以后不跟着在政治上也及时地实行新方针,那么实行“新方针”这个大胆的行动将是没有成效的。正因为我们深信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同俄国革命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有权利和有义务来证明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变革,唯有这种变革才会使俄国革命、同时也使国际无产阶级免遭最严重的灾难。

奥托·鲍威尔

1921年11月12日于维也纳

1. 苏维埃共和国的第四年

彼得堡的士兵和工人推翻克伦斯基政府而使苏维埃政府执政的四周年的日子，前几天到来了。俄国这四年的历史是史无前例的英勇斗争的历史，是充满令人鼓舞的胜利和骇人听闻的失败的历史。西欧和中欧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斗争条件尽管与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发展条件不同，但是西欧和中欧的工人阶级仍旧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利用从这四年的经验中得到的认识促进他们本身的斗争。因此，现在正是回顾一下俄国革命在苏维埃共和国四年中的发展的时候了。

苏维埃共和国的头三年是国内战争的三年。在这期间，俄国的农民和工人经过无数次流血战斗战胜了高尔察克、都托夫、邓尼金、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的反革命军队，打退了协约国及其仆从的武装进攻，为苏维埃政府征服了整个俄国。这战争的三年，是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官僚统治机器、红军和万能的警察组织“契卡”的时期。这三年同时是俄国国民经济完全听命于革命的国家政权的时期。在这三年，俄国的全部工业国有化了，农户的一切剩余被国家征用了，商业完全被压制了。国家征用农户的产品，把这些产品分配给城市居民。国家把其工厂生产的工业品运往农村，把它们分配给农民。资本主义看来完全铲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现了。

但是，这三年的国内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俄国的国民经济。农民知道，他们经营出来的任何剩余都将被征用，所以他们自己食用

需要多少就只耕种多少。在1920年，粮食播种面积比战前减少18.5%，马铃薯播种面积减少27%。同时，由于缺少牲畜、肥料、农具，每公顷的收获量也大大地下降了。根据斯特鲁米林的数字，1920年谷物收成的纯收获量只有18亿普特，而1913年为30亿普特。^①但是，工业比农业还糟得多。由于工人营养不足，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由于工业的官僚主义领导的缺点，工业生产严重地下降了。克鲁敏把1920年的工业生产同1913年的生产作了对比。根据他的计算，1920年的情况如下：

| | | |
|------------------|-----------|-------|
| 铁矿石产量 |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 2.25% |
| 盐产量 |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 17% |
| 原油产量 |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 40% |
| 煤产量 |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 20% |
| 生铁产量 |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 2.12% |
| 机器产量 |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 25% |
| 棉纱产量 |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 5.6% |
| 亚麻线产量 |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 25% |
| 糖产量 ^② |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 6% |

当战争和国内战争在苏维埃制度的第三年末终于结束，当苏维埃共和国终于赢得和平的时候，人们就必须着手重建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但是，苏维埃政府起初认为，可以通过变本加厉地使用它在战争期间使用过的那些办法来实行重建。托洛茨基起草了他的使工作军事化的纲领。工厂应当军事化，工人应当置于严格的军事纪律之下。他们指望借此提高劳动强度。小资产者、农民、被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家属应当被征入劳动大军，并在军事强制下进行劳动；他们指望由此为巨大的公共工程获得劳动力。他们甚

^① 1921年3月31日《经济生活报》。——作者注

^② 1921年5月27日和28日《经济生活报》。——作者注

至认为可以使数百万农户服从官僚主义的领导；国家应当规定它们耕种什么和怎样经营土地。^① 卡尔·考茨基在他的卓越的近著《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② 中激烈地批驳了这一军事官僚社会主义的空想；但是，早在考茨基的批判发表以前，历史本身就已经使那一切计划遭到了更加无情得多的批判。

1921年春，俄国各个城市笼罩着一片可怕的粮荒和油荒。忍饥受冻的工人开始骚动起来。他们的愤怒首先指向工业劳动的军事化。在战争期间，苏维埃政府把工人束缚在企业中；工人不许离开自己的企业而在另一个企业中就业。现在工人强烈要求恢复他们的迁徙自由。但是工人同时也反对由国家管理粮食供应。如果国家无法分配给他们规定的粮食定量，那它就必须给予他们为自己在农村弄到粮食的自由。比工人的这种动荡还要危险的是同时也在加强的农民的动荡。农民起来反对以军事手段征用他们的产品。他们要求有权自由支配他们经营出来的剩余产品，要求恢复自由贸易。在这以前农村已经一再有人集成匪帮来反抗武装的征收分队，袭击小城市中的行政机关，破坏铁路；1921年春这种匪徒骚动在唐波夫、沃龙涅什和萨拉托夫三省、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具有很大的规模。西伯利亚的暴乱使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之间的交通完全断绝达两个星期之久。这种骚动终于也波及红军的个别部队，首先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在农村度过他们假期的水兵，沾染上农民中间流行的那种不满情绪而返回了舰队。”^③ 这样，喀琅施塔得暴乱时骚动达到了顶点。

① 参见1920年12月《俄国新闻简报》上拉林、奥新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的文章。
——作者注

② 考茨基《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同托洛茨基的辩论》1921年柏林《自由》出版社版。——作者注

③ 普列奥布拉斯基《一个新的时期》，1921年6月《俄国新闻简报》第416页。
——作者注

苏维埃政府把所有这些暴乱都顺利地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些暴乱向它证明，它不能沿着迄今走过的老路继续走下去。由于工人、农民、士兵的反抗日益增长，通过发展军事共产主义即以军事化强迫劳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实现重建的一切计划破产了。在1921年春天那些骚动的压力下，苏维埃政府放弃了所有那些计划，并且下决心尝试以完全相反的办法着手重建。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新方针”开始了。

“新方针”只对工人作了小小的让步。一般说来，工人仍旧被束缚在工厂里。只有当一个工人一直被迫干着非本行的工作或者在自己住地以外工作时，他才被允许在自己的住地找个本行工作做。对农民作出的让步要大得多。军事征用制取消了。完全象在奥国那样，农民仅仅必须向国家交纳一个份额——在俄国称之为“实物税”；他们收获的剩余部分可以由他们自由支配。这样一来，粮食的“自由贸易”首先恢复了。但是，最大的让步是对被认为在三年战争中已经克服了的资本主义作出的。苏维埃政府对用官僚军事共产主义的办法克服经济混乱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它认为，只有通过发挥“个人首创精神”才能克服这种混乱。列宁本人现在教导说，应当“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①。因此，苏维埃政府不仅开放了资本主义贸易，而且还把战争期间已经社会化的工厂、矿山、森林拿出来租给国内和国外的资本家。同时，它竭力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贸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它完全改变了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它恢复了银行业务，它修改了有关民法的法令，它向外国资本表示准备偿还沙皇政府的对外债务……春季在暴乱的压力下采取的“新方针”，到了夏季和秋季在歉收和饥荒的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25页。——译者注

压力下愈来愈确定下来了。

列宁于10月17日在“政治教育局”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苏维埃政策这一惊人的转变作了如下的论证：

“同志们，你们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虽然有些人还非常年轻，但都是在我们革命初期，在我们一般政治工作方面作了很多工作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你们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所以你们不能不看到，我们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已经实行了多么急速的转变，采取了一种被叫作‘新的’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有着更多的旧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曾经假定过，旧的俄罗斯经济将直接过渡到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的国家生产和分配。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国家经济文献，回忆一下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前和刚刚夺得政权以后，例如在1918年初所写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刚刚完成了建设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对于经济建设任务的谈论，比1918年下半年以及整个1919年和1920年要小心谨慎得多。当时我们多少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在我们肩上，由于我国似乎已经陷入绝境，由于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情况而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不能说我们就是这样明确地给自己拟定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当时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动的。不幸这是一个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时期终于使我们相信，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所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言论相抵触的，那时我们在理论上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自1918年提出接受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作了说明以来，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即使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

条道路,也必须经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的过渡时期,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当我们在国内战争剧烈而不得不在建设方面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好象把这一点遗忘了。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在这方面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开始作战略上的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打垮的时候,让我们实行退却,重新安排一切并安排得更牢靠一些吧。共产党人既然自觉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问题,那么对我们在经济战线上遭受惨败这一事实,就不能有丝毫怀疑!”^①

列宁所说的“急遽转变”,苏维埃政府现在采取的“新经济政策”,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第四年的结论。我们将在一系列文章中描述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个“新方针”;因为各国工人阶级如果要学习和利用伟大的俄国革命的经验,它就必须首先弄清布尔什维主义的这种彻底转变的原因,并且认识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2. 资本主义贸易和苏维埃资产阶级

苏维埃共和国国内的历史,是城乡之间为粮食进行顽强的和严酷的斗争的历史。革命前,农民必须把他收获的一部分出售,以便能够向国家交纳捐税,向地主交纳地租。1917年的土地革命取消了农民的捐税和地租;农民不再被迫把他收获的一部分东西卖给城市。革命前,农民还必须把他收获的另一部分卖给城市,以便用得到的钱购买工业品;但是,从1917年起,由于封锁和本国工业遭到破坏,城市不再能向农村出售工业品,而农民不会为了不能拿来交换工业品的贬值的纸卢布而出让他的辛勤劳动的果实。这样,城市遭到农村的封锁;它再不能取得必需的粮食了。于是它试图

^① 引自苏俄半官方的“俄罗斯电讯社维也纳分社”1921年11月1日的报道(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44页。着重号是鲍威尔加的)。——作者注